



秦汉时期晋文化形态研究

高专诚

摘要:秦汉时期,随着天下政治的大一统,思想文化领域的地域特色也有所减弱。但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晋文化却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地理环境特点,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即主导晋地发展的河东文化、凸显民族融合的塞北文化和以士族文化为核心的并州文化。晋文化的多样性、区域性和积极性,使得秦汉时期的晋文化发展出新的形态,不仅为此后晋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为秦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秦汉;三国;晋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4)04-0066-07

秦汉时期,随着天下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思想文化领域的地域特色也有所减弱。晋地却在继承和发扬先秦时期晋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地域文化的转型发展。晋地政治格局明朗,文化结构明晰,这在其他地域中是少见的。此外,其表里山河的地理形势,越是在上古时代,越是容易形成相对封闭的政治环境,从而衍生出有自己发展线索的文化结构。

先秦时期,晋国和三晋国家的多元文化格局深刻影响了秦汉时期晋地文化的多样性,晋地南、北、中三个区域的文化特点鲜明,承继的是先秦时期韩、赵、魏和北方民族的文化基因。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大禹的时代,天下分为九州,晋地属冀州。周人灭殷后,把冀州分为幽州和并州两部分。当时的晋地,南部为并州,北部大部分地区属幽州。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对全国行政区划作了很大调整。晋地西南部为河东郡,河东郡往北,即现在的山西中

部,是太原郡。晋地东南部山区,先秦时称为上党,秦朝沿用此名,建上党郡。晋地北部地区,南部属雁门郡和代郡,西北部的一部分属北地郡,一部分属云中郡,东北部则属上郡。汉朝基本保持了秦时区划,究其根本还是晋地南、北、中三部的经济发展不同,政治和军事地位也有明显区别,特别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历史文化差异,造就了各个地区明显不同的风俗。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晋地南部、北部、中部的差异如此鲜明,从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习惯到服饰和语言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似乎不应该是一省一区之内应有的现象。但是,从深层次上来看,由于地理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晋地南、北、中地区的贯通和联系却是连绵不绝。久而久之,地区间的不同却成为南北联系、取长补短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就是在晋地三种不同的区域文化交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晋文化。

收稿日期:2014-01-28

作者简介:高专诚,男,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山西太原 030006),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思想史及三晋文化研究。

一、河东文化独领晋地风骚

晋地是中华先民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晋南地区高温与雨季同期,土地广袤而肥沃,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发达地区。《孟子》记载曾子的话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1]89}说明至少在春秋末期,晋地的富饶已经闻名天下了。

晋南古有河东之称,即大河之东。河东之名,由来尚矣,《国语·晋语三》载:“归惠公而质子圉,秦始知河东之政。”^{[2]329}不过,在晋国和三晋时期,河东之名只是一种习惯说法,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地理或政区名称。秦朝建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河东居其一。秦朝建都咸阳,西汉建都长安,都在同一地区,与晋地河东郡只有一河之隔。河东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楚汉相争时期,河东郡虽然不是主战场,却是战略必争之地,更是军队长期后勤补给的不二选择。

秦朝灭亡后,来自先秦魏国旧地的魏豹盘踞河东。汉王刘邦东进,考虑到该地在天下得失中的重要地位,派出主将韩信击败魏豹,使河东之地成为刘邦巩固的大后方,为其建立西汉王朝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两汉易代之际,河东易守难攻,是进击长安地区的战略要道。刘秀委派大将邓禹引兵西进,占领了更始帝刘玄控制之下的河东地区,逐步控制了正处在混战之中的整个西部地区。邓禹完成任务之后,光武帝刘秀派出使者到河东,拜邓禹为大司徒,还专门下诏,称赞邓禹“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3]602}。东汉末年,在与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袁绍集团的对垒中,曹操两度亲征晋地,并持续任用名臣杜畿治理河东,说明晋南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这与汉高祖派韩信占据晋南,汉光武帝派出大将邓禹攻占晋南和晋东南部,有着同样的战略考虑。

上述三次重大军事行动,为西汉、东汉和曹魏王朝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历史进程的重复演进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今山西太原以南地区历来是米粮重要产地和人口稠密地区。在上述王朝建立的过程中,该地区是最重要的

进可攻、退可守的大后方,以及军粮和兵源的重要供给地,堪称得河东者得天下。

西汉前期,担任河东地方长官的官员一直不乏朝中名臣。比如高帝和文帝时的名将周勃就被封为绛侯,老死河东。汉文帝时,名臣季布担任河东郡守,文帝嘱咐季布:“河东吾股肱郡。”^{[4]1977}三国时代,当曹操亲身感受了河东郡在其打江山过程中的重要性之后,同样认为“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5]497}。

汉武帝时期,河东地区逐渐由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地区上升为文化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汉武帝祭祀河东后土祠之举,更是影响汉代文化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6]451}汉武帝巡视东方,在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的黄河边上看中了一个被称作“雎上”的大土堆,随即下令,在这个大土堆上兴建后土祠。所谓“后土”就是伟大的土地之神,与“上帝”对应。最早的河东后土祠形制比较简单,但从唐宋以来不断扩建,增加殿堂造像,逐渐形成后世的宏大规模。“雎上”后土祠建成后,根据司马迁和宽舒等人的建议,汉武帝亲自到此祭拜,开始了祭祀后土祠的漫长历程。据记载,自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首次祭祀后土祠之后,汉武帝多次亲临后土祠祭祀。《西京杂记》记述:“汉朝輿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大仆执轡,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7]33}各级各地官员、车驾人员不计其数,规模之大,耗费之巨,令人瞠目。汉武帝对后土祠的祭祀促发了西汉历代帝王祭祀后土祠的热情,足见后土祠在西汉政治中的重要性。到后世,虽然只有唐玄宗和宋真宗祭祀过后土祠,但后土祠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地位却不容忽视。汉朝之后,有许多地方都建起了后土祠。在王朝的都城,后土祠则逐渐演变为地坛之类的祭祀土地神之所。

汉武帝祭祀后土祠之初,听取了有关大臣们的意见,具体提供意见的是太史司马迁和祠官宽舒等人。而司马迁正是河东郡人,汾阴后土祠也正在其家乡之畔。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昔在颍项,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

黎以司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太史公司马谈在对儿子司马迁的临终嘱咐中也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在周惠王、周襄王时代，司马氏一族就离开东周，来到晋地。“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司马氏所居之地，皆在河东郡及其周围地区。所以，司马迁才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6]3285-3293}龙门即今山西河津，一说今陕西韩城。其实，河津与韩城邻黄河而望，当时的龙门，很可能地跨黄河两岸的河津与韩城两地。司马迁年少耕牧的“河山之阳”，就是河之北、山之南。其中的河之北之河，应当是指汾河。因为该地段黄河由北向南而行，不存在河之北的问题。韩城境内并无大河，汾河则流经河津南部。河津北部，古有龙门山。山之南之山，当是龙门山。这样一来，河山之阳，正在河津区域之内。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记》之前的《左传》和《国语》中有关晋国的历史记述占有较大篇幅。在《史记》中，虽然叙事方式与《左传》和《国语》不同，但仍然延续了《左传》和《国语》对晋地历史的重视。晋地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在《史记》中有大量记载。比如发生在春秋后期晋景公诛杀赵氏家族的历史事件，《史记·赵世家》称为“下宫之难”。这一事件在《左传》和《国语》中本有明确记载，但司马迁却不惜利用民间传说，改编成以“赵氏孤儿”为核心的戏剧性事件，以抒发自己身遭“李陵之祸”的冤屈，抨击时人缺乏忠勇赴难、伸张正义的精神。这正如司马迁所申明的，他写作《史记》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2735}。身为史官，司马迁的创作宗旨，与晋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官，如董狐、史墨等人所坚持的“以史匡时”的史官精神是一致的。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与晋地历史文化同样颇有渊源。班固的史学巨著《汉书》，多涉晋地的历史文化。从班固先祖与晋地历史的久远联系着眼，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班固及《汉书》对晋地历史文化的情怀。据《汉书·叙传》记

述，班氏先人是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人。秦灭六国，子文的后人被迫迁移到今山西中北部一带，并去掉了与楚国有关联的熊姓，以“班”为姓氏。秦始皇统治末期，班氏家族首领班壹率全族迁徙到雁门郡楼烦（今山西岚县、静乐一带），以畜养马牛羊而致富。经过五世，到两汉易代之际，班氏家族出现了著名学者班彪。其子班固，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任典校秘书，专心于学问，以著述为业，写成《汉书》。《汉书》虽然是记录西汉历史的通史，但如果留心去读，还是能够看出班固对晋地的特殊关注。

河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孕育了像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史学大家，也激发了文士的创作热情。西汉后期著名文学家扬雄曾在河东地区游历，所作《河东赋》为晋文化增色不少。扬雄先祖周伯侨曾食采邑于晋国扬地（在今山西洪洞），其后人便以扬为氏。扬雄说：“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4]3516}扬雄喜好辞赋，闻名于当时。西汉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汉成帝效仿武帝故事，率群臣横渡黄河，祭祀了河东后土祠，并要求扬雄以长赋记载这一政事。于是，扬雄慨然落笔，写下了流芳后世的《河东赋》，用以劝谏汉成帝，盼望汉成帝在追观先代遗迹的同时，自兴至治，实现上古帝王的政治成就。

东汉学者桓谭认为，扬雄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思想必然会流传后世。《汉书·扬雄传》也称其作品是“文义至深”^{[4]3585}，到了合适的时代，一定会受到明君贤人的赏识，成为传世之作。历史完全证明了桓谭和班固的远见卓识，《河东赋》这样的不朽之作，也带着历史的芬芳，成为晋文化的光辉篇章。

三国时代，曹操任用杜畿长期治理河东，促进了河东文化建设，使河东文化成为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人，官至汉中府丞。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杜畿弃官归乡。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听从谋士荀彧的建议，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此时，天下郡县深受战乱影响，残破不堪。杜畿以宽惠政策待民，河东民生逐渐趋于安稳。杜畿还要求河东农民畜牛、养马，甚至到养鸡养猪，政府

都有详细的章程。几年之后,百姓勤农,家家丰实。杜畿又进而实行冬季修戎讲武的制度,开办学宫,亲自执经教授。他还四方招纳名流,如河东名士乐详,“归乡里……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5]507}。利用长时间担任郡守的有利条件,杜畿坚持促进文化建设,史称“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5]496}。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晋南一带的文化确实较之于晋地其他地区更为发达,这显然是与该时期杜畿的努力分不开的。作为一代名臣,杜畿不仅在曹魏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有给养战士之功,而且对于晋南部的经济发展和晋文化的建设也作出了卓越贡献。

河东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从早期晋国开始,这里就是晋文化发轫的中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不仅孕育了法制文化,也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地区。秦汉以降,河东作为股肱之郡,经济和文化地位的重要性有增无减,从帝王的关注,到史家和文士的推动,直到三国时代杜畿的长期经营,终于使河东文化结出灿烂的果实。

二、民族大熔炉中的塞北文化

自古以来,晋地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会的天然通道。秦汉以来,由于内地成为统一国家,而与晋北地区相接的匈奴人也获得了长足的社会发展,使得内地政权与匈奴政权之间的冲突在晋中北部地区显得尤其突出。楚汉交兵之际,冒顿成为匈奴人首领。乘着刘邦与项羽征战不已,中原无暇对外的机会,“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6]2890},开始了对内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侵扰和掳掠。

西汉时期,对匈奴政策是汉代朝廷的大事。总的来说,汉代朝廷对匈奴的政策也不过是和亲与战争之间的抉择。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韩信投靠匈奴,次年汉高祖出兵晋北,在平城白登(今山西代县东北五里平城村)一带被匈奴人围困七日,险些丧命。之后虽然脱险,并把匈奴人逐出晋北地区,但匈奴威胁依

然严重。后来,刘邦采纳大臣刘敬的建议,以“和亲”政策对待匈奴人,收到了一定效果。此后,惠帝、文帝和景帝三朝基本上以和亲为主。汉初之所以选择和亲,主要是由当时天下久战而和的形势和朝廷休养生息的主导方针所决定的。汉武帝即位后,随着汉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一方面很想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一方面还要实现其开疆拓土的宏图大志,就开始了与匈奴政权的长期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中,晋地成为汉军主要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晋北地区则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之一。这是因为,一则晋地农业发达,能够提供最便捷最可靠的军需供应;二则晋北地区有广阔的地域,便于军队行进和对垒。在晋北旧广武(今山西山阴)一带,至今还留存着大片的汉代墓葬群,墓中埋葬的就是汉代对匈奴作战中死去的将士。经年累月的战争,给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损害,同时,对于当地的风俗、文化、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等,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扬名于晋地的著名将领,主要有李广、卫青和霍去病等人。李广是西汉文、景、武三朝的著名将领,在汉朝前期内地与匈奴人的军事冲突中屡立战功。其当年征战塞北的战场,主要是在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以北的广大地区。李广箭法精良,骁勇善战,被匈奴冠以“汉飞将军”^{[4]244}称号。如果说“飞将军”李广是对匈奴战争中前期的主要战将,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则是后期的主要统帅。此三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除了把消灭北方的军事威胁视为无上的责任和荣誉之外,都是在晋地这块土地上建功立业的,而卫青、霍去病二人更是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是山西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卫青相对稳重,在与匈奴人的作战中,很少建立奇功和大功。到霍去病征战两军阵前时,匈奴人的力量已经开始下降,在与汉军的作战中出现了败多胜少的情形。这个时候,以霍去病的年少气盛和超人胆识,建立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军功,非常符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脾性。据《汉书》载,因霍去病屡立战功,汉武帝特意给他建了一座宅第,让他去看下是否合适,霍

去病的回答成为千古名句,即:“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4]2488}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武帝时代对匈奴作战的最重要和最知名的两位领军人物。二人一个沉静有余,一个勇猛无比,共同成就了汉武帝拓疆扩土的宏愿,也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尽的英勇故事,更为晋地增色无限。

东汉时期,在汉军攻击和匈奴内乱的双重作用下,匈奴人势力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北方强族是东胡人和鲜卑人。但是,东汉政权一直比较稳固,与北方民族的冲突也一直规模较小。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民族才开始大规模南下,晋北地区又成为民族冲突的主要地区之一。北方民族的内迁和定居始于西汉后期,当时的匈奴人在汉军攻击下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人归顺汉朝,开始在内地定居,于是比较熟悉的晋中北部就成为他们定居的首选地区。东汉时期,甚至河东郡也成为鲜卑人定居的地区。经过几百年的民族融合,晋地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熔炉之一。

东汉时期民族大熔炉的大功告成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也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重大意义。这一时期形成的民族大熔炉,主要出现在塞北地区,也就是包括雁门关关隘南北的附近区域。短期来讲,民族大熔炉的形成,为该地区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对这一地区社会文化方面带来了深刻和全面的长久影响。

第一,由于民族大熔炉的形成历经多年,必然要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格局产生深层次影响。晋北地区本来就有尚武习武、好勇斗狠的风俗,在长期战争背景下,这种风俗更为突出。李广、卫青和霍去病,征战塞北战场,立功无数,对于晋地军事文化和塞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秦汉时期,塞北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长期的战乱更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经常陷于困顿之中。经年累月生活在困顿中的人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会受到磨炼,坚强不屈的意志会得到加强。直到今天,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是晋北地区重要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信念。

第三,晋地自古便是民族杂居之所,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民族长时期生活在一起,本来就有相互接受,甚至相互帮助的传统。特别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这种情形更为普遍。战争无疑是血腥的,但在和平时期,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不可化解的仇怨,通商甚至通婚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表现在这里的宽容精神,是根深蒂固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第四,经过了长期战争的洗礼,和平之后的人们再次过上正常生活,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行为方式,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最终融合为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该新文化适应性更强,是代表时代方向的先进文化。

三、并州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两周时期,河东地区是晋文化的中心地带。战国中后期,三晋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扩张,晋文化也随之走向四方。在晋地,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向是晋地中部和北部,但是,晋中地区形成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却是在西汉以后。

晋中地区自春秋中后期才被大规模开发,此前为多民族杂居之地。《国语·晋语九》记载:“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2]491}赵氏家族很早就意识到,在晋国故地与各大家族的竞争中很难获得全盘胜利。于是,赵简子时代就开始向东向北发展,向北发展的根据地就是晋阳(今山西太原)。在经营晋阳的初期,赵简子任用尹铎进行城邑建设和管理,任用窦犇和舜华等人负责社会教化。特别是窦犇、舜华等文士,孔子曾引以为同道,可证明这一地区的文化建设颇有根基。春秋末期,智氏、韩氏、魏氏三家围攻赵氏,赵氏据守晋阳,三年未被攻破,最终反败为胜,与晋阳城内军民素质较高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秦国统一天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晋中部为太原郡。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击败反叛的赵国,“乃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6]389}。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后,陈平、周勃等一批高祖旧臣平息诸吕叛乱,废掉吕后选定的

少帝,选择代王刘恒继位,是为汉文帝。汉文帝在位期间,由于对内对外战事稀少,使他有时间到各地考察,尤其经常出入于晋中地区这块他曾经为王的故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汉文帝巡视北边,继位后第一次回到晋阳,停留了十几天,说明其对于故地还是相当留恋的。此后,汉文帝又多次回到代地,还把次子刘武封为代王,三子刘参封为太原王,这也说明了他对于受封故地的重视。刘恒做代王近20年,做皇帝22年,对晋阳地方的治理,如同他治理天下一样,主要是以文治之。据《西京杂记》记载,刘恒还在做代王时就在晋阳建造了一个“思贤苑”^{[7]17},专门招待天下贤人。该建筑规模宏大,内部装饰也很考究,以表现对贤人的思盼和重视。后世许多史学家都认为汉文帝是历史上最能关怀民间疾苦、不劳烦民力的帝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汉文帝日常生活非常朴素,没有帝王式的奢华。去世之前的汉文帝发下遗诏,反对厚葬伤生,也不让全天下人为他举哀。在生前建造陵墓时,其要求只用瓦器陪葬,严格禁止使用金银铜器。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例。汉文帝这样做的原因,除了他的个性使然,晋地朴实的民风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两汉交会之际,长年战乱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看法和从政态度。特别是王莽乱政,使知识分子的政治迷惘更加严重。王莽夺权和建国所采取的政治主张和措施,对于一向以儒家学说为思想重心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消极影响。汉光武帝刘秀再次建立刘氏政权时,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一下子从长期的政治困惑中解脱出来,很多名士宁可处贫,也不食君禄,拒绝参与现实政治。在这方面,尤以一批太原名士表现得最为坚定明确,他们的言行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东汉时期并州文化圈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秀即位之初,任命侯霸为尚书令。当时,朝廷新立,制度草创,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侯霸就利用其影响力,征辟和任用各地名士,以期及时有效地稳定新王朝的政治和思想秩序。当

时,太原人闵仲叔应侯霸的请求来到京城。可是,首次见面时,侯霸只是慰劳问候了闵仲叔一番,并没有马上谈到治国之事,这使闵仲叔感到非常失望,明确表示不能在朝中做官。后来,朝廷又让闵仲叔担任博士,他始终没有答应,坚持了名士的政治敏感和正直。闵仲叔的好友,太原人周党,在坚持政治和生活操守方面与闵仲叔齐名,号称“举动必以礼”^{[8]83}。东汉初年,朝廷多次征召,周党不得已来到都城洛阳。见到汉光武帝之后,周党明确表示情愿守志,做个平民百姓。一些朝臣对周党的表现大为不满,光武帝下诏:“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3]2762}另有太原郡王霸、郇恁等名士,同样不肯听从当政者的召唤,宁肯隐居山林。

对于名士们此类言行,《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中评论道:“肆然独往,不可袭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为用者,庙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隐显之道焉。”^{[8]84}知识分子的政治品质,不能在现实中的进与退来评判。不管他们是隐居山林,还是官居庙堂,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和良心所在。加之晋地中部理性而沉稳的文化传统,以及周秦以来三晋世家大族的政治风尚,使得一大批隐士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太原地区,应该说并非偶然。

东汉中期,周举出任并州刺史。《后汉书·周举传》记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所谓“介子焚骸”,讲的是晋文公之臣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有功,却未被重用,就选择了隐居不仕。民间传说认为,介子推出走介山(一说在今山西介休),晋文公下令以火驱之现身,不幸被山火焚烧而亡。“龙”指木星,春天出现在东方,象征火。“龙忌”就是忌火、禁火。《周举传》接着说:“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周举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上任不久就来到介子推庙祭祀。周举在祭文中说:“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接着颁布命令,要求老百姓一定在这个季

节吃热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3]2024}。

由介子推被焚的故事而出现的寒食节,在东汉中期已经基本定型,并成为晋中地区重要的民俗节日。从西汉末年到十六国时期的300多年间,以纪念介子推忠义之行为缘由和核心的寒食节,已经从晋中地区发展到全国,成为一个以晋中绵山为中心的全国性节日。到宋代,寒食节与清明节、上巳节等其他传统节日归拢,终于形成一个集寒食、祭亲、踏青为一体,并且延续至今的人文内涵丰富的传统节日。

从晋文化的视角来看,从寒食节到清明节,体现了鲜明的并州文化特色。介子推被焚而死是寒食节出现的关键,但在正史记载中,介子推并不是被焚而死。直到西汉末期,才大规模出现了介子推被焚的过程和细节,这直接导致了两汉之际“不火食”的民间习俗的产生。这个习俗的产生,与王莽篡汉以后,大批士人究竟是忠于汉朝还是忠于新朝的两难选择有关。此习俗之所以能在并州一带盛行,与上述以周党等人代表的讲原则、重气节的并州士风是一致的。

东汉后期,天下士人多半持有反对宦官专政的立场,屡遭政治迫害。在这种政治压制下,士人形成了自己的集团,以及这种集团特有的政治品质。这种集团的维持并没有成文的法则,而主要是依靠集团内部某些个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行。这方面,太原介休(今山西介休)人郭泰独树一帜,《后汉书·郭太传》中评论郭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3]2226},在当时形成了巨大影响,也为晋地历史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任何一个社会区域内,经济发展最终要表现为文化发展。反过来看,文化发展则有利于社会安定,是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晋地中部以太原为中心的并州文化圈的形成,源头是先秦时代晋国社会上层的文化气质,经过汉文帝时代的培育,以及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社会大动荡的洗礼,到魏晋时期形成了不同于河东文化和晋北文化的文化取向。并州文化以

士林为中心,推崇士人的气节,强调士人的社会责任,其大局观和历史意识非常浓厚。即便是在社会下层影响巨大的“寒食节”,其核心价值仍然是介子推式的忠义气节,并最终得到全天下的认可。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魏晋以后,晋阳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前秦在此地建都,建立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五代时期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也都是在晋阳起事称帝。为此,人们甚至视晋阳为龙兴之地,称“龙城”。

综上所述,在秦汉时期,与晋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相一致,晋文化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态势;与晋地不同区域的不同经济发展和军事地位相一致,晋文化也表现出区域性的特点;与晋地由南到北经济政治发展的程度逐渐由强到弱、由深到浅相一致,晋文化也显现了南强北弱、南深北浅的特征。但是,一直以来对秦汉时期晋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是相对滞后的。一般认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晋地的文化特征并不明显;在皇权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地域文化很难形成特色;在文化人才向朝廷所在地大量集中的时期,各地的文化成就只能处在次要的位置上。但在晋地,晋文化的多样性、区域性和积极性,却使得秦汉时期的晋文化发展出新的形态,不仅为此后晋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为秦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编.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3]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晋·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汉·荀悦,晋·袁宏.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原 孟]